

YINGCHUANGZAGANLU

萤窗杂感录

郭盛福 著



贵州教育出版社

萤窗杂感录

郭盛福 著

贵州教育出版社

萤窗杂感录

郭盛福著

贵州教育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贵州省社科院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625印张 292千字

印数1—2,000册

1993年9月第1版 1993年9月 第1次印刷

ISBN 7-80583-432-6/G·431 定价：5.90元

序

刘学洙

有一次我和友人闲聊，谈及一位同志出了一本杂文集，嘱我写一书评。对那位作家，我素很尊敬。但总觉他的杂文有过多的“保险系数”，每批评一事，必先正面肯定一番，可以看出作家尚有余悸在心。当时我感慨地说：既然怕，就最好不要写杂文。

这些年，我读了不少杂文，也写了一些杂文。总的感觉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杂文比过去多，好的也时有所见。不过，放不开，多有顾忌，仍是杂文写作的通病。这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在内。杂文，不是不可以歌颂光明，但杂文这种文体，它的最大优势，还是揭露黑暗。匕首、投枪、解剖刀，总是要指向腐败的东西。光明的社会有没有黑暗：要不要一刀见血地解剖和刺杀？这是建国后一再争论的老问题。有的人就因为提倡鲁迅笔法遭到围攻以至迫害致死。现在谁也无法否认，新社会也有黑暗。否则，如何解释那一部文革史？唯其总体光明，就更应该大胆揭露黑暗。可是，环境往往使人不敢这样做。因为，歌颂光明总是受欢迎的。揭露黑暗，黑暗势力固然恨之入骨；即使是光明方面有时也不一定高兴。甚至会疑神疑鬼，把好心当敌意，以为别人是在影射光明，抹杀光明。所以，杂文家受当局青睐的不多，而招来

文祸的却不少。这是很可悲哀的。

尽管如此，还是有不少人爱杂文，写杂文。这说明，新时代仍需要杂文，还产生着杂文家。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杂文总是不知趣地顽强地生存着、抗争着。三中全会的春风，更是吹绿了杂文园地的新草。虽然有时也有春寒，但有生命力的东西毕竟仍然要生长出来。在我省新闻界朋友中，不少杂文爱好者，这些年著作颇丰，郭盛福同志就是其中之一。他是我的老同事，好文史，好古诗，勤谨笔耕，在省内外报刊发表了许多杂文。近以一厚本剪报见示，果然积稿盈尺，选读了一部分，有不少佳作。比如，《趋炎附势溯源》、《倨与恭的思索》等文，都相当尖锐。把那种“依附于自己的后台与靠山，又充当别人的后台与靠山，形成上上下下的依附关系”，剖析得相当深刻；把那种“倨与恭的变化最能体现出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描绘得维肖维妙。郭君是位老编辑，一辈子爬格子，忠于职守，为他人做嫁衣裳，不图官，不图利，在条件并不算宽松的情况下，写了这么多杂文，还有旧体诗，散文，这是难能可嘉的。但是，从其中有些文章中，作者下笔时尚多踌躇，不大放得开。这也难怪。几十年从风风雨雨中走过来的文人，为自己的文章“安裝”一点“安全阀”，也是环境使然。既然，写杂文，总有点风险。那么，多有一些同志，不甘寂寞，不甘沉默，多写一些杂文，而又不犯规，能对匡正时弊起点作用，总是一件好事。因此，对于杂文界多出些成果，我总是于心窃喜，并引为同道的。各人有各人的风格，各人有各人的优势，各人有各人的处境，只要是为了正确的大目标，有利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和国家的振兴与进步，所有的杂文都是应当受欢迎

的。

夏衍在《迎新忆旧》一文中，有一则关于杂文的史话：“1949年上海解放后，《新民晚报》在上海继续刊行，当超构（林放）同志问我，‘可不可以再给我们写一点点’的时候，我请示了陈毅同志之后，便欣然同意了，我想写点杂文，只是为了‘过瘾’，而陈毅同志则比我想得更加全面，他鼓励我写，还说，可以写得‘自由’一点，千万不要把党八股带到民办报纸里去，和贵报口径不同也不要紧。……后来有人讲怪话，就主动收摊了。”

事隔四十多年，现在看来，以夏公之尊，以陈毅元帅之宽广胸怀，提倡写点杂文还不免“有人讲怪话，就主动收摊了”，可见杂文命运之艰难。从这角度看，我以为我们都应该为自己的杂文自豪。郭君要我写序，一下笔就不可收拾，离题太远了。写这些心里话，与郭君共勉吧。

1993年4月10日

目 录

杂文的“针砭时弊”	(1)
杂文的风格	(3)
杂文要杂	(5)
妙在似与不似间	(8)
杂文写作之管见	(10)
杂文也要植根于生活	(13)
新春赞柳	(16)
缘木求鱼”不可取	(18)
“竞争有道”	(20)
做官要详情	(22)
桥	(24)
说假与道真	(26)
“聪明”与“痴傻”的尺度	(28)
做那行学那行	(30)
“千金买马骨”和“屡败屡战奖”	(32)
“君无戏言”的联想	(34)
读金台凭吊诗有感	(36)
功与过	(38)
“溜须”古今谈	(40)
“当局不迷”	(42)
成果自有千钧力	(44)

乌龟精神与白兔的污点	(46)
须防依样画葫芦	(48)
我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50)
本钱及其含意的延伸	(52)
岂忍乐道者安贫	(54)
理解小议	(56)
良言一句三冬暖	(58)
倨与恭的思索	(60)
信赖在于了解	(62)
掌声与倒采	(64)
趋炎附势溯源	(66)
思乡与明月	(68)
岂容袖手又旁观	(70)
莫让百姓论短长	(72)
“绿叶精神赞”	(74)
“近墨者”析	(76)
家风与家教	(78)
班门何须忌斧	(80)
身后留下什么	(82)
话说“让”与“怒”	(84)
好计策与烂点子	(86)
赞“牛心未改”	(88)
“枕边风”异议	(90)
人贵有志	(92)
纳言应有气度	(94)
“要牌子”与“搅浆子”	(96)

闲话“手长为大哥。”	(98)
说得失	(100)
扫除溜须遗风	(102)
务实与求名	(104)
荣誉在于奉献	(106)
公仆的规范	(108)
但愿人往“低处”走	(110)
长于交际 短于治学	(112)
要谱写人情的新篇章	(114)
友谊琐谈	(117)
业精于勤	(119)
“重义轻利”析	(121)
自挑毛病赞	(123)
但愿少一些误解	(125)
物先腐而后虫生	(127)
南辕岂可蹈北辙	(129)
认识自己 完善自己	(131)
旅行与读书	(133)
警惕谄谀者的毒剑	(135)
人际关系与“拉关系”	(137)
小家与大家	(139)
书还是要多读	(143)
谈吃“小灶”	(145)
于细微处见精神	(147)
莫愧对劳动民族称号	(149)
把握人生之春	(151)

谈荐贤任能	(153)
漫话爱国主义教育	(155)
纵观时髦话穿着	(157)
从求福避祸说起	(160)
失败与成功	(162)
历尽寒冬倍惜春	(164)
依附关系不容颠倒	(166)
“兼收并蓄”别议	(168)
红桔飘香的启示	(170)
有胆还需有识	(173)
要勇于坚持正论	(175)
信心——力量——事业	(177)
“表现好”与“好表现”	(179)
有权亦须有责	(181)
“皇帝女儿”应愁嫁	(183)
紧俏须防劣质品	(185)
同行理应是“亲家”	(187)
青年先驱者的夙愿	(189)
由“戒珠寺”说开去	(191)
谨防乘虚而入	(193)
“至理名言”的变迁	(195)
劝君莫打退堂鼓	(197)
选择贵在明智	(199)
富有和贫乏	(201)
“观念更新”析	(204)
得可资 失亦可资	(206)

滥竽充数何时休	(208)
从纨绔子弟说起	(210)
似“看透”实看错	(212)
“和”与“随”析	(214)
说“感情投资”	(216)
稳字新说	(218)
摒弃嫉妒之心	(220)
按照比例与提倡竞争	(223)
治愚治穷之本	(225)
联想未必是事实	(227)
排除忧心	(229)
方寸之间见天地	(231)
龙年话愚公	(233)
爱美也是爱生活	(235)
浅谈为民解愁	(237)
让“八互”精神蔚然成风	(239)
读书断想	(242)
盖章拿钱议	(244)
人应有别于工具	(246)
谦让是美德	(248)
赞誉的背后	(250)
信任方能成知己	(252)
爱正义而恶邪恶	(254)
反常现象不可忽视	(256)
抓紧每一个今天	(258)
是终点还是起点	(260)

文人要相重	(262)
致富千条路	(264)
艰苦创业岂能忘	(266)
爱国方能报国	(268)
一个“报”字见精神	(271)
送行贵在情真	(273)
“明察秋毫”一析	(275)
求雨应是有旱情	(277)
愿卖弄者慎勿卖弄	(279)
对话不是训话	(281)
矫往岂能过正	(283)
“事必躬亲”不可取	(285)
脸色与心态	(287)
魏惠王爱珠宝与齐威王爱人才	(289)
马后论珠宝与贤才	(290)
熊廷弼爱才竭诚	(291)
娄师德暗荐贤才	(293)
两闻和兼听	(295)
子皮让贤和助贤	(297)
李世民为何不兴土木	(299)
闻言不可不察	(301)
苏轼生平拾遗	(303)
谈笑登泰山	(305)
瑞雪兆乡关	(308)
乌江岸边卖鱼郎	(312)
屈指姑苏多少桥	(316)

枫叶情深	(318)
“益补万春” 益万家	(326)
川黔线上的铁道卫士	(330)
永远难忘的邢大夫	(336)
灾区军民鱼水情	(341)
征程十载风霜苦荒山万亩变药园	(345)
荒山辟出致富路	(350)

杂文的“针砭时弊”

“针砭时弊”。乃杂文的一大特点，这也是杂文引人注目之处。当人们切齿痛恨的某一时弊，在杂文中受到针砭之后，莫不如饮琼浆，痛快之极。故不少读者对杂文颇感兴趣。

既然“针砭时弊”是杂文的一大特点，我们勿论是写杂文也好，读杂文也好，都必须弄清楚“针砭时弊”的真正含意。“针砭”即医生扎针，“时弊”则是指当时社会存在的某种弊病。这两个词联在一起，说明了“针砭时弊”的目的在于改变这种不良现象。这一特点也体现了杂文本身的性质和任务。故杂文既不能超凡脱俗，与世无关；又不能吟风弄月，无病呻吟；更不能像巫婆和神汉那样，打着治病的幌子，故弄玄虚，信口雌黄，愚弄和欺骗群众。

正因为“针砭时弊”是杂文的一大特点，这就要求作者在对“时弊”的认识和理解时，不应怀有任何陈见和偏见，要历史地、全面地分析问题，不能只是两眼向上，把一切责任都归罪于领导、归罪于政策、归罪于社会主义制度，而对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时弊，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但不作针砭，反到一步一趋，一唱一和，这就未免失之偏颇了。少数领导人中的官僚主义、以权谋私、任人唯亲等时弊，固然应当针砭，而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等

时弊，在杂文家的笔下亦应加以揭露，让广大人民群众在思想上认识它的危害性，从而提高警惕，增强免疫能力。

众所周知，作为文学体裁之一的杂文，其战斗性是极为强烈的，被人们喻之为“投枪匕首”，是革命斗争的锐利武器，在白色恐怖的年代，它常常是一针见血地刺中敌人要害，使敌人为之胆寒。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它的战斗性则表现在维护四项基本原则，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向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及一切歪风邪气作斗争，并发人自省，催人奋进。如果不遵循这些原则，以出气为由乱放横炮，无事生非，挑起矛盾，影响安定团结。这样的杂文及其作者，本身就是一种时弊，理应列为针砭之列，与“唤起民众，振奋精神”的社会责任感，是极不相称的，愿与杂文作者共勉！

杂文的风格

前些日子，和一个杂文作者谈起杂文写作，他曾经这样坦率地告诉我：“杂文写作一是要针砭时弊，使文章具有战斗性；二是要引经据典来说明问题，使文章具有知识性。”他的这一论点在当前的杂文写作中，确实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且也不无道理。从编辑部收到的杂文稿件来看，确实是针砭时弊的文稿居多，且言必引经据典。不过，有的稿件虽然使用了针砭之术，但不讲求部位和分寸，往往起到了不良的效果。有的稿件虽罗列了不少史实，往往是旧调重弹，趋文附雅，尚不足以说明实质性问题。

杂文原是一种议论体的散言，它无疑也应当像散文一样，具有多种多样的风格，并从生活中获取素材，作到有感而发。如果只强调一种风格，一个模式，杂文写作的路子势必越走一窄，且也不能全面反映社会的真实情况。先秦时期正因为百家争鸣，各抒己见，各树一帜，给散文创作带来了勃勃生机；唐代的古文运动，正因为否定了华而不实，风格大同小异的骈体文，才迎来了文起八代之衰；“五四”以前的新文学运动，正因为批判了一个模式的八股文和桐城谬种，才迎来了散文创作的繁荣昌盛。因此，针砭时弊，以古喻今，只能是杂文中的一种风格，绝不能代表所有杂文的风

格。我们今天的杂文风格应当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针砭时弊、鞭挞邪恶，又可以歌颂现实、激励新风；既可以尖锐泼辣，又可以温良敦厚；既可以理直气壮，又可以委婉曲折。但无论是鞭挞与歌颂，其目的都在于使我们生活的社会主义社会，日益健全完善，步入光明美满之境。

纵观今古，杂文这种文体从来就是千姿百态，风格各异。韩愈的《师说》、《马说》立论精辟，言之成理；柳宗元的《捕蛇者说》虽针砭时弊，但曲折感人；周敦颐的《爱莲说》则是以物喻人，寓意深刻。近代鲁迅、茅盾、郑振铎、闻一多、朱自清等名家撰写的议论体散文，各具特色，众彩纷呈，人们读之，简直是一种艺术享受，并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当年鲁迅杂文之所以具有强烈的战斗性，被人们称之为“投枪匕首”，那是因为他生活在豺狼当道的社会，把杂文作为揭露敌人、打击敌人的武器。而今政治清明，新风扑面，虽说存在着某些不正之风，全党上下正采取强有力措施克服纠正。故歌颂光明、抑浊扬清、鞭策后进，理应是当代杂文的一大特点。五彩缤纷的现实生活，必然会迎来杂文写作风格上的百态千姿。